

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

宋平明

【提要】 作为美国口述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与美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同步同频,推动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不断发展,并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口述历史研究方面,里奇更多地倡导“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比较重视口述历史理论的研究;但是,就其本人的口述历史实践来看,里奇自始至终都聚焦于美国的精英和领袖人物,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

【关键词】 唐纳德·里奇 口述历史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理论转向

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是美国口述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参议院历史学家,担任过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和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理事会成员,出版过多部美国历史教科书及多部学术著作。因在口述历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里奇先后荣获大西洋中部地区口述历史协会颁发的“福里斯特·波格奖”(Forrest C. Pogue Award)(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历史学会颁发的“亨利·亚当斯奖”(Henry Adams Prize)(1992年)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颁发的“理查德·利奥波德奖”(Richard W. Leopold Prize)(1992年),在美国以及世界口述历史领域享有极高声誉。

口述历史或口述传统虽然历史久远^①,但直到1948年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创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才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研究的诞生。随后,口述历史学运动开始席卷整个美国甚至世界,各个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者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各类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历史学会、各种专业协会及各级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在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到“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转向”再到“理论转向”的发展历程,并随着录音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迭代。作为美国当代口述历史学家,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与美国的口述历史的发展同步同频,既是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美国口述历史不断发展的引领者。事实上,里奇在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成就与美国口述历史的重要转向息息相关。然而,长久以来,国内口述历史学界对于里奇在口述历史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主要聚焦于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另一本是其编著的《牛津口述史手册》。^②除此之外,国内学界似

① 在唐纳德·里奇看来,口述历史和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一样历史悠久。在西方,口述历史的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写作方式(参见Donald A. Ritch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而在东方,三千年前的中国周朝时期就有了口述历史的传统(参见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

② 国内对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主要聚焦于他的口述历史经典名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邱霞《“做”口述历史的实践规范与理论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潘玉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评介》,《北京档案》2014年第8期。

乎对里奇在美国当代口述历史领域的贡献和成就缺乏系统介绍和研究。鉴于此,本文拟系统梳理里奇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的历程,在厘清他如何积极参与并引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口述历史发展的同时,分析其在口述历史领域的特点和倾向。

一、从“精英口述历史”开始

自1948年艾伦·内文斯开创美国现代口述历史研究算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的口述历史的研究计划主要是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的精英人物进行口述历史访谈,主要目的是获取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口述历史当时还无法得到美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经费短缺,专业的口述历史从业者队伍很不稳定,相关成果也难以得到学界承认,从业者进行口述访谈获得的访谈资料更多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档案而已。正如杨祥银指出的那样,“在当时那些并不认可口述历史价值的传统美国史学家看来,口述历史唯一值得记录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首脑人物。”^①因此,这种注重美国各界精英领袖人物的口述历史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是美国口述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美国的这种“精英口述历史”帮助里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使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的风格与特点。

里奇出生于1945年,1967年本科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1969年硕士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并于1975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里奇之所以进入口述历史领域,是因为他研究生时期修了一门关于访谈的课程,开始对口述历史产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选修这门课程使他“误打误撞进入了口述历史领域”。^②但是,真正让里奇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是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詹姆斯·M. 兰迪斯(James M. Landis)作为研究对象。^③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里奇费尽周折收集了兰迪斯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所有文稿,以及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保存的兰迪斯口述回忆记录文本,还从兰迪斯的遗孀和女儿那里拿到了其全部私人文稿,并采访了其家庭成员、同事和助手及其心理医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以全面揭示兰迪斯的神秘面纱。在一次访谈中,里奇谈到该书的写作过程,“在研究兰迪斯的手稿的时候……我发现了兰迪斯在去世之前所做的一个口述历史访谈的最后30页内容。经过细致调研之后,我发现兰迪斯这篇长达700页的口述文稿收藏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这对一个传记作者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因为这是研究对象用自己的语言阐述的自己的人生。这种以第一人称呈现的口述文稿,会让大家所了解的那些兰迪斯的事情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和更直接的面貌。尽管这篇口述文稿向人们展示了兰迪斯作为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但是很少展示他的私人生活。

①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② *Interview with Donald A. Ritchie*, 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ies, September 25, 2015. https://nunncenter.net/ohms-spokedb/render.php?cachefile=2015oh416_ii003_ohm.xml [2022-06-01]

③ 詹姆斯·M. 兰迪斯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进入美国政界,历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1933—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35—1937年);1937—1946年,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任美国民防局地区主任(1941—1942年)、美国民防局全国主任(1942—1943年),后来在杜鲁门政府中任美国民航局主席(1946—1947年),还做过约瑟夫·P. 肯尼迪的法律顾问和约翰·F. 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1956—1960年,因为偷逃个人所得税,1963年兰迪斯被判刑一个月。

这篇文稿几乎没有谈到他的两次婚姻,很少谈及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谈多少关于他偷逃个人所得税的事情(这件事情把他送进了监狱)。因此,我开始实施我的口述访谈,我访谈了兰迪斯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他的心理医生。这些口述历史访谈极大地影响了我这本传记的写作。”^①里奇在写作时采用了口述历史访谈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全景式呈现了兰迪斯复杂多面的人生,也让读者了解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的财政和监管政策的曲折发展历程。里奇的博士论文《詹姆斯·M. 兰迪斯:美国监管者的院长》于1975年完成,并于198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迈克尔·比齐罗斯在评价里奇的这本著作时指出,“在这本书中,里奇成功地将美国管制时代的历史和兰迪斯丰富而又悲剧的人生交织在一起并呈现给我们。”^②

综上,对于里奇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笔者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这本学术著作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完成的,其中一部分访谈由他亲自进行,还有一部分是他利用了别人对兰迪斯访谈的口述文本;第二,里奇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方式契合当时美国口述历史主流研究方式——“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③

自此之后,这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一直主导着里奇的口述历史实践。尤其是在1976年以后,里奇供职于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任助理历史学家,其口述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依旧是当时盛行于美国的“精英口述历史”模式。任职期间,里奇访谈了诸多美国参议院的前任参议员和退休的工作人员,完成了诸多美国参议院口述历史项目。他还出版了诸多学术作品,如《新闻走廊:国会与华盛顿的记者们》《美国国会:学生指南》《美国的记者:全面报道新闻》及《我们的宪法》等。^④虽然这些著作很难被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但是里奇在写作的过程中采用了或是参考了自己用口述历史访谈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在里奇看来,获取美国各界精英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最终目的,而是要用来解释和理解美国联邦机构等国家机构的运行。这符合美国第一代口述历史学家遵循的口述历史研究模式——“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模式,主要是将口述历史访谈获取的访谈记录作为历史研究的补充资料。里奇指出,“几十年来,口述历史学家已经收集、处理并保存了相当多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用之来理解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和运行。”^⑤

在里奇看来,联邦政府的口述历史学家在开展口述历史访谈时有自身的一些优势,比如,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政府机构的各种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公开的还是尚未解密的。^⑥作为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的助理历史学家(1976—2008年)和特邀历史学家(2009—2015年),里奇有机会接触到的研究对象和访谈对象大多是参议院的参议员及高级工作人员,其主导和负责的美国参议院口述

① Interview with Donald A. Ritchie, 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ies, September 25, 2015. https://nunncenter.net/ohms-spokedb/render.php?cachefile=2015oh416_ii003_ohm.xml [2022-06-01]

② Michael R. Beschloss, “Review of James M. Landis: Dean of the Regulato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5, No. 5, 1982, p. 1185.

③ 兰迪斯虽然谈不上是美国的领袖级别的政治人物,但至少算是美国法律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在特定时期能够对美国的政界和法律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肯尼迪和罗斯福》(Kennedy and Roosevelt)的作者迈克尔·比齐罗斯认为,詹姆斯·M. 兰迪斯不能算作美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次要人物,即使他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也不能算作美国一流的学者。参见 Michael R. Beschloss, “Review of James M. Landis: Dean of the Regulators”, p. 1185.

④ 这四本书目前在国内没有中文译本。Press Gallery: Congress and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ent Compa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merican Journalists: Getting the 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Our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Donald A. Ritchie, “Or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 2, 1987, p. 587.

⑥ Donald A. Ritchie, “Or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 593.

历史研究项目也都是有关美国高层政治,不太可能涉及美国社会所谓的弱势群体或是少数群体。因此,在口述历史的实践层面,里奇和当时美国的主流口述历史学家一致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模式。正如迈克尔·弗里斯科指出的那样,“凭借艾兰·内文斯在哥大的研究项目,美国口述史学逐步开始发展,并主要聚焦于政治史和外交史,其主要任务是让那些大人物(the Great Men)在去世之前能够进行‘汇报’(de-briefing)。本质上,它显然是档案的、信息的和精英主义的。”^①而且,在美国的口述历史学界发生了所谓的“新社会史转向”之后,里奇的口述历史实践仍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与其工作的性质和氛围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里奇在口述历史关注的群体范围及具体的研究方法随着“新社会史转向”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自下而上”的口述历史研究模式和方法。

二、超越“精英口述历史”并注重“做”口述历史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和社会运动,不少美国历史学家呼吁彻底摆脱美国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史观,将研究视野下移,更多地关注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等下层普通民众。受这种趋势的影响,美国第二代口述历史学者将自己的访谈对象扩大到过去不受重视的少数或弱势人群,让这些长久以来被传统历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去记录和书写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社会底层民众在形塑美国历史方面起到的作用。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口述历史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显著特征,出现极为显著的“新社会史转向”。^②杨祥银指出:“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新社会史转向’不仅为那些处于非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与弱势群体记录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口述史学所具有的‘民主动力’(democratic impulses)很大程度上也挑战和改变了传统美国史学主要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传统书写模式。”^③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口述历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渐成主流,在美国少数族裔史、女性史、社区史等新社会史领域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口述历史作品。

如此声势浩大的“新社会史转向”必然对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产生影响。里奇在一次访谈中称:“20世纪70年代,口述历史的范围还很窄。当时,我最初结识的那些口述历史学家们经营着大型档案馆,并倾向于采访政、商、军界的杰出人物。与这种‘着眼于上层’的研究路径相反,之后的口述历史范围更宽,囊括了诸多社会和文化问题。”^④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女性及其他少数族裔或群体甚少谈及,这一点让里奇深感震惊,并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里奇指出,看到这种状况之后,他认为很有必要“对女性进行口述史访谈,对黑人进行口述史访谈,以及对那些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来没有出现的人群进行访谈”。^⑤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口述历史的访谈中来,普及口述历史的方法和原则就成为里奇要重点考虑的工作了。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在盘式磁带录音机向盒式录

① Michael Frisch, “Oral History and *Hard Times*: A Review Essa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7, 1979, p. 73.

② 关于美国口述历史的“新社会史转向”,参见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128—192页。

③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191页。

④ “福州船政文化口述历史计划”项目组通过邮件对唐纳德·里奇的访谈,采访者:邓啸林,受访者:唐纳德·里奇,翻译者:马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771881 [2022-06-01]

⑤ *Interview with Donald A. Ritchie*, 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ies, September 25, 2015. https://nunncenter.net/ohms-spokedb/render.php?cachefile=2015oh416_ii003_ohm.xml [2022-06-01]

音机转变的同时,口述历史也开始从主要关注政治、商业与军事领袖等精英人物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研究计划向关注那些之前被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的群体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计划转变。”^①可见,里奇对美国口述历史学界的这种转变认识非常清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特威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特别重视当时盛行于美国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口述历史学著作的出版。里奇指出“自从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开始注重记录‘自下而上’的那些历史事件,特威恩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口述历史作品开始关注美国女性群体和少数族裔。”^②因此,1988年,特威恩出版社邀请里奇负责编辑出版一系列新的口述历史作品,这些著作大多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普通士兵、集中营的俘虏、学校的女教师、女外交官、母亲和女儿、女性矿工、非裔美国人等美国少数族裔和群体及美国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从1990年到2000年,经里奇之手编辑并由特威恩出版社出版的聚焦于美国女性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口述历史系列著作达26卷之多。^③

但是,即使编辑出版了如此之多的关注美国少数和弱势群体的口述历史著作,里奇觉得还是无法达到让更多的底层民众发出自己声音的预期。因此,指导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口述历史及其从业规范就成为里奇特别关注的问题。1995年,里奇口述历史经典名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由特威恩出版社出版。随后,根据口述历史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里奇对《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进行了持续修订。这本书成为世界各地口述历史研究者和从业者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和工具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劳伦斯·莱文认为“作者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极为全面、影响深远、富有魅力的口述历史入门书。它将成为那些计划应用口述历史的学生和学者的基本指南,同时,对于仅仅想要获得有关这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历史研究领域知识的读者,本书同样是重要的引路之作。”^④确实,莱文的评价十分中肯,指出了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作为口述历史工具书的属性,让读者能够在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之前获取基本的操作规范并了解基本的行业标准,让尽可能多的人愿意并且能够从事口述历史工作,进而扩大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让底层民众和草根群体有机会发

① 唐纳德·里奇《口述历史的世界》,《口述历史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② Donald A. Ritchie, “From Sound to Print and Back Again”,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11, No. 3, 1997, p. 7.

③ “26卷”这个数字来自于唐纳德·里奇的自述,具体参见“福州船政文化口述历史计划”项目组通过邮件对唐纳德·里奇的访谈,采访者:邓啸林,受访者:唐纳德·里奇,翻译者:马浩。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771881 [2022-06-01]根据唐纳德·里奇的统计,部分书目如下: Rhoda G. Lewin, *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 An Oral History* (1990); Stephen C. Fox, *The Unknown Internment: An Oral History of the Relocation of Italian Americans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1990); Richard M. Stannard, *Infantry: An Oral History of a World War II American Infantry Battalion* (1993); Heather I. Frazer and John O'Sullivan, *We Have Just Begun to Not Fight: An Oral Hi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in Civilian Public Service during World War II* (1990); Katrina R. Mason, *Children of Los Alamo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Town Where the Atomic Age Began* (1995); Ruth E. Wolman, *Crossing Over: An Oral History of Refugees from Hitler's Reich* (1996); Diane Manning, *Hill Country Teacher: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One-Room School and Beyond* (1990); Corinne Azen Krause, *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Daughters: Oral Histori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Ethnic American Women* (1991); Jewell Fenzi and Carl Nelson, *Married to the Foreign Servic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Spouse* (1994); Ann Miller Morin, *Her Excellency: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Ambassadors* (1995); Marat Moore, *Women in the Mines: Stories of Life and Work* (1996); Gabrielle Morris, *Head of the Class: An Oral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Achie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eyond* (1995); Andrew J. Dunar and Dennis McBride, *Building Hoover Da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93); Bruce M. Stave and John F. Sutherland, *From the Old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 (1994); David D. Perata, *Those Pullman Blu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frican-American Railroad Attendant* (1996)。具体参见 Donald A. Ritchie, “From Sound to Print and Back Again”, pp. 6-8。

④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版) 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封底”。

出自己的声音。

在里奇自己看来,《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可以用作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口述历史项目管理者的指导手册,指导如何实行、推进和保存口述历史访谈,并且能够将这些口述历史访谈变成出版的作品公之于众。这本书的写作模式是一问一答式的,很像一个口述历史访谈记录,这能够给那些口述历史从业者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解决方案”。^①可见,里奇写作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口述历史的工作中来,并且能够给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人群提供符合口述历史协会要求的专业规范和标准,从而达到人人能做口述历史,人人应做口述历史的目的。里奇在第二版前言中写道“人们不应将本书看作是菜谱似的作品,所以,本书也不提供具体的作料和成分、确保成果的品质或是烹调的要诀。相反,本书针对口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广泛的讨论,随附的注释和参考书目能够用来提示专业质疑和检索专业资料。”^②另外,在写作该书时,他就特别注意到当时口述历史领域的一种新趋势:虽然口述历史学家仍旧关注为研究者提供相关档案资料,但是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学家感到有必要将他们的访谈成果回馈给那些接受他们访谈的社区,并且有必要去吸引这些社区民众来阅读他们的学术作品。^③因此,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中,除了策划、实施及保存口述历史访谈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法和规范之外,里奇也开始关注对美国社会底层民众的口述历史访谈,并提供了自己对此类访谈的相关操作和执行建议。在该书的第八章“口述历史呈现”(Presenting Oral History)部分,里奇专门以“社区史”和“家庭访谈”为例来探讨口述历史的呈现方式。而且,在之后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中,里奇对相关部分做了更深入和广泛的分析。

里奇还参与了美国甚至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相关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这十分有利于口述历史的普及和发展。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二版)“前言”中,里奇回忆道“从1988年到1991年,我和口述历史协会一起合作,努力修订和改进口述历史的专业范本和标准,并提出评估的指标。”^④他还特别关注口述历史在各级学校中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广泛地普及口述历史,有更多的机会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因为“通过倾听那些经历过历史的人们的声音,学生能够更加容易想象出那段历史”。^⑤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在教学中应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口述历史可以为那些已经厌倦了枯燥的课堂并想方设法让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的教师提供服务”,^⑥因为学生能够更好地记住亲自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另外,口述历史应用于课堂教学,还能让学生更真切地理解和认识曾经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事件,“让学生有机会去和那些经历了历史事件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⑦在美国的各级教学机构中,将口述历史应用于课堂教学已经成为愈来愈流行的教学方式,在丰富课堂教学手段的同时,这种方式也增加了公众对于口述历史的认可度。正如杨祥银所指出的“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美国历史学和相关学科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它不仅适用于中小学、大学与研究生教育,同时也广泛应用于社区和继续教育;同时,在应用专业领域,它已经超越历史学而成为英文、新闻学、文

① Donald A. Ritchie, "From Sound to Print and Back Again", p. 7.

②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

③ Donald A. Ritchie, "From Sound to Print and Back Again", p. 7.

④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p. 15.

⑤ Donald A. Ritchie, "From Sound to Print and Back Again", p. 8.

⑥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93.

⑦ Donald A. Ritchie, "Teaching the Cold War through Oral History",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8, No. 2, 1994, p. 10.

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戏剧学等众多学科的重要教育手段。”^①

总之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 随着美国口述历史的“新社会史转向”渐成主流 美国的第二代口述历史学家 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或是档案 而且更加关注美国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及边缘群体等社会底层民众 从而超越了之前的精英主义口述历史模式 扩大了美国口述历史的研究视野和实践范围 出版了大批相关群体的口述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 里奇作为美国口述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亲自编辑、撰写、编著了大量口述历史作品 并配合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制定和规范口述历史的相关标准 不断参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相关工作 将美国口述历史学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许多会议都会吸引数十个国家高校内外的数百个口述历史学家参加,他们可能来自罗马、悉尼、里约热内卢和伊斯坦布尔等不同的城市”。^② 在国际上,口述历史也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一直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从本土人、土著和原住民,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③ 可以说 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口述历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里奇功不可没。

三、重视口述历史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 无论是先前的“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口述历史模式 还是后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转向” 都比较注重口述历史的档案和文献功能 只不过前者更加关注的是美国精英和权势阶层 而后者更多聚焦美国社会底层及少数群体和族裔。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学者比较注重口述历史所最后产生的访谈文本 不太关注和研究口述历史访谈的产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即只重视最后的结果 而忽略了过程等程序性问题。因此 随着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美国口述历史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更深层次的口述历史理论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 在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发生“新社会史转向”的同时 美国的口述历史学界甚至整个西方史学界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理论转向”^④ 开始关注口述历史的一些理论性问题 比如记忆的真实性和主观性 口述历史访谈的访谈者和受访者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和相互关系问题及口述历史访谈本身的叙事性 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的执行、存储及呈现等。

众所周知 受访者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根本来源和核心问题 也是口述历史得以成立的根本。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采集、保存、加工并传承原本隐藏在相关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记忆 因此“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 口述历史必须着力探究记忆的采集、保存及遗忘问题”。^⑤ 正是因为记忆对于口述历史如此重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史学界围绕记忆的主观性、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等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发表并出版了大量关于口述历

①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 335 页。

② Donald A. Ritch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p. 16.

③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xii.

④ 杨祥银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美国口述历史“理论转向”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1. “记忆转向”(memory turn): 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記憶的主观性与真实性问题? 2. “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 受访者的记忆呈现以来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与口头叙述 因而受政治环境、访谈场合、社会性别、族裔与教育等社会文化因素所影响的叙事形式与叙事策略如何影响口述历史内容的呈现与诠释? 3. 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 其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访谈过程与解释结果? 参见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 193—232 页。

⑤ 左玉河《固化、中介与建构: 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5 期。

史与记忆问题的研究成果。^①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可谓这一时期讨论口述历史与记忆问题的代表作。因为该书不仅是一本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指南,而且涉及很多重要的口述历史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口述历史的性质、记忆的可靠性等等。具体而言,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中,里奇吸收并借鉴了美国甚至西方口述历史学界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将之列为书中重点讨论的专题,在第一章中专门列出了“记忆与口述历史”这一小节进行讨论和分析,并在全书的多个地方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随后,在2003年的第二版及2015年的第三版当中,里奇更是扩大和深化了对于口述历史与记忆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比如,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三版中,里奇专门增加一个小节讨论电影、电视及小说对人们记忆的影响。在里奇看来,虚构的历史事件描绘可以渗入人们的记忆深处。^②因此,在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时,访谈者需要将流行文化的影响考虑进去。确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观看大量的电影、电视及小说等,其中有些历史虚构作品极度流行,会影响相当一批生活在当代的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记忆。为了向读者进一步阐释该如何处理虚构历史作品对于口述历史的影响,里奇具体讨论了对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进行访谈的问题。里奇指出,有些学者发现,在对越南战争老兵进行访谈的时候,有些老兵为了迎合美国越战电影、电视等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影视形象,会刻意讲述自己从战场返回老家时被人吐口水的故事,所以不应该再对美国越战老兵进行访谈;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无法证明美国越战老兵是否被吐过口水,但是这些描述中的细节如此丰富,以至于让人难以否认其真实性。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些学者建议学生在做类似的研究时不要再去采访退伍军人,更好的方式是通过阅读有关战争的历史书去了解相关情况。但是,里奇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在里奇看来,阅读历史书和口述历史访谈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要做好相关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否定访谈美国越战老兵的意义。因此,里奇指出,“阅读和访谈不是排他性的行动;好的访谈取决于事先的研究。最好听听退伍军人的抱怨而不是将其视作公众的臆想而将其一笔勾销。”^③里奇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解决建议,是因为他相信“怀疑主义不是人们普遍拒绝接受大批实践亲历者的记忆和观点的正当理由”;^④而且他还认为“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全部成就”。^⑤

在进一步讨论口述历史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问题时,里奇指出,“处理口述史料要像处理任何其他形式的史料一样严肃谨慎。”^⑥因为受访者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可能是有选择的,可能是自说自话,也可能是真的忘记了。所以,里奇建议,一个好的且受过专门训练的口述历史访谈者要能够引导受访者详细叙述某些往事,也可以继续追问受访者口述内容与文字资料不一致的地方。最后,里奇指出,“口述历史不应当以孤证自满,研究人员应找出可信的资料来印证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料。如果口述与文字内容互相矛盾,那么研究者就要更深入地挖掘,以便判断哪一种史料更为准确。”^⑦毫无疑问,从现代口述历史的标准来看,里奇对于口述历史与记忆关系的问题的分析和建议是切合实际并且行之有

① 美国及西方口述历史学界关于口述历史与记忆问题的研究成果,参见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194—216页。

②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22.

③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23.

④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22.

⑤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p. 33.

⑥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110.

⑦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113.

效的。针对这一点 左玉河也有类似研究。在讨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时 左玉河指出“当下建构的记忆必然是有误差的记忆,口述历史又是减少和矫正误差的工作,是保存记忆、对抗遗忘的工作。”^①“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之真和记忆之真,而不应过分纠缠于口述文本之真伪。口述历史不能呈现全部的历史真实,只能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应该着力发掘记忆之真而减少记忆呈现的阻隔,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②

但是,必须认识到,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本口述历史实操指南,更多地聚焦于“做”,而不是纠缠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分析。毕竟,在里奇看来,“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滞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访谈实践的。”^③因此,在里奇看来,“《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是致力于为那些计划进行并收集口述历史访谈的人员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合理的解释。它的重点在于‘做’。”^④因此,《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三版的译者邱霞指出,放下一切顾虑,尝试去“做”,进行口述历史实践,这是我们阅读和利用这部书的出发点及落脚点。^⑤故而,在该书中,里奇将更多的精力和篇幅聚焦于如何“做”口述历史的实际操作规程上,“最大限度地给出了确保口述历史可靠性和学术性的具体方法”。^⑥

2011年,里奇主编并出版了《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也许是为了弥补之前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对于口述历史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记忆问题着墨过少的遗憾,在这本书中,里奇尤其突出了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和根本问题——记忆问题,拿出了该书的一个大模块专门讨论口述历史和记忆的关系问题,认为“口述历史和记忆研究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却能相互兼容”。^⑦而且,在《牛津口述历史手册》的第二部分“记忆与历史”(Memory and History)中,里奇选编了六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与回忆的过程和关系,记忆的集体性与公共性,记忆的政治性,以及创伤性记忆等问题,并在其中穿插了两个案例研究以考察口述历史对于记录、反思和治疗创伤记忆的重要意义。^⑧在该书的其他部分,里奇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口述历史访谈的本质”问题、“理论和解释”问题、“技术影响”问题、“法律、道德和归档的迫切需要”问题,以及“口述历史的呈现”问题,这些都是美国及世界口述历史学界在当下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在这些理论问题当中,第四部分“技术影响”和第六部分“口述历史的呈现”聚焦讨论数字化技术对于口述历史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当代口述历史学所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因此,在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开始注重“理论转向”的大趋势下,里奇在倡导和呼吁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和愿意去“做”口述历史的同时,也留出一定的精力去研究口述历史实践中诸如记忆问题等理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口述历史的发生过程并给口述历史的实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理论指引,进而逐步提升学界对于口述历史从业者和口述历史成果的认可度。

① 左玉河《固化、中介与建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xv.

④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xv.

⑤ 邱霞《“做”口述历史的实践规范与理论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第3版),邱霞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426页。

⑦ 唐纳德·里奇编《牛津口述史手册》,宋平明、左玉河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⑧ 这六篇文章分别是:第五章,阿里斯泰尔·汤姆森《口述历史中的回忆和记忆》;第六章,安娜·格林《记忆可以是集体的吗》;第七章,亚历山德罗·波特利《案例研究:罗马的记忆和历史之家——记忆和公共机构的政治》;第八章,费德里科·吉尔勒莫·洛伦兹《如何赢得一个失败的战争?口述历史和政治记忆》;第九章,肖恩·菲尔德《令人失望的遗留: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创伤、证词和和解》;第十章,菲利普·丹尼斯《案例研究:与南非感染HIV病毒/艾滋病的儿童合作的记忆工作》。具体内容参见 Donald A. Ritch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pp. 77-165。

结 语

总体而言,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趋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①这一点总体上与美国口述历史的发展脉络是一致的。但是,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里奇一方面呼吁所有人都能“做”口述历史,所有人都应该“做”口述历史,并为此专门编写了口述历史工具书——《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给从业者提供“做”口述历史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同时,里奇也呼吁美国口述历史学者更多地去关注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等传统史家在书写历史时所一贯忽视的人群。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纵观里奇本人的所有口述历史作品,其关注的重点人群仍旧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关注底层民众的著作。

里奇关于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领域的这一特点在其最新的口述史著作中也有体现。2022年1月,里奇与泰利·伯德惠斯特尔(Terry L. Birdwhistell)合著的《华盛顿的铁蝴蝶:贝丝·克莱蒙茨·阿贝尔》(*Washington's Iron Butterfly: Bess Clements Abell, an Oral History*)由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美国约翰逊总统的白宫社交秘书(White House Social Secretary)贝丝·克莱蒙茨·阿贝尔本人及她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等人物的访谈来讲述贝丝不平凡的一生。可见,即使在退休之后,里奇口述历史研究的对象还是美国的政界高层而非普通民众,这可以看作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惯性。毕竟,作为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荣休历史学家,里奇的社交圈和关注重点层仍旧是美国政界高官,这是由他几十年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及口述历史研究习惯决定的,这也是他本人一贯的口述历史兴趣点和关注点。

其实,早在退休之后不久,里奇就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在口述历史实践中的这种倾向和特点。2016年2月,在一次名为“度量一个传统机构的变革:美国参议院内部的口述历史”(Measuring Change in 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Oral History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的演讲中,里奇谈道“美国参议院是美国政治机构中最为历史悠久和传统的机构。尽管参议院内部有很多次尝试去让这个机构变得更加现代化,但是口述历史访谈显示,来自外部的社会、技术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力量能够给参议院带来更多的深远变革。对美国参议员及参议院的工作人员的口述历史访谈,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度量参议院内部所发生的深层变革,尽管在外人看来似乎参议院从来没有有什么变革。”^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讲话中,里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揭示美国上层政治机构的变化和发展仍旧可以归类为“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而非“自下而上”的口述历史,这符合其一贯的口述历史实践倾向。

(作者宋平明,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编:101149)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其实,在唐纳德·里奇看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可能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只是访谈的对象不同而已。他认为,虽然“口述历史学家一直就‘精英’和‘非精英’访谈之间的是非曲直展开争论,但是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认为同样的方法论适用于上述两种访谈”。参见 Donald A. Ritch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p. 5.

② Lecture by Donald A. Ritchie: Using Oral History as a Tool for Measur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https://www.cvce.eu/en/actualites/2014/viewer_news/-/news/168864?refererPlid=10184 [2022-06-01]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s of women's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Kemalist women's liberation is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urkish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flict between feminism and patriarchy and nationalism, but also present the tension between Turkey's radical Western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reforms and Islamic tradition.

Donald A. Ritchie's Practice and Study of Oral History // Song Pingming

Donald A. Ritchie is one of the key participants and leading scholars of American oral history. His engagement with oral history has kept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has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but also made great and profound contributions at its various stages in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Ritchie followed a "bottom-up" approach and called for ordinary people to "do" or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own work, he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ose top American elites and leaders, which is a typical "top-down" "elite oral history".

Focus, Perspectives and Trend of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Unit 731 // Yang Yanjun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the Unit 731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the initial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when documentary literature, oral history, and memoirs were the mainstream and some relevant scholarly works started to appear. The second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During this perio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scholars in China, Europe, and America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Scholars from scientific,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participated in it and contributed to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Meanwhile, literary narrative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ueling the flames". The third is the stage of "multi-dimensional mat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means, not only horizontal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Japanese medicine and Nazi medicine, but also vertical in-depth studies from diversified disciplines. While focusing on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reflection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researchers have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oversea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hav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ir scholarly works, but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breakthrough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wartime situation, war crimes and responsibilitie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 post-war trauma,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Unit 731.

Space, Type and Tren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 Zhang Junfeng

The fiel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flourishing. Not only does it have an extensive coverage of research areas but also a diverse profile of research interests. It follow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social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ydraulic engineer. As a result, it shows that the hydraulic societie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ontain both similarities and their own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field has undergon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early studies on hydraulic engineer project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hydraulic technologies, to the current social histor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the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water with "water being at the center" in the future. This is a natural developme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s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central role of wat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water-relate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destined to be moving towards a new level.